

走向持续发展的未来,从“重庆松林坡”到“伊斯坦布尔”

Marching toward the Futur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

吴良镛

(清华大学,教授 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 100084)

我在 40 年代初期开始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。当时“二战”方酣,在被重重封锁的重庆,竟然在松林坡上的中央大学图书馆中,看到越过“驼峰”(喜马拉雅山)运来的缩微胶卷,得到一些为数不多的美国《建筑论坛》(Architectural Forum)等杂志上的信息;尽管暗室中闷热异常,挥汗如雨,但我惊奇地发现西方建筑界并未因战火的硝烟而无所作为,相反却在信心百倍地“放眼未来”,致力于“战后城市重建”、“战后住宅建设”的研究,这使我心中顿觉豁然开朗。在这股洪流影响下,我把自己的专业追求也置身于世界范围的“战后重建”之中,并从中得到力量。这一切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世界在前进,城市在发展,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学术也在发展。半个世纪以来,可称作里程碑的学术会议很多,但全世界最为重大的事件,莫过于刚刚谢幕的,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人类住区第二次大会或称为世界“城市高峰会议”(City Summit),这是继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“环境与发展”大会或称为“地球高峰会议”(Earth Summit)之后的又一世界大事。半个世纪以来,这一头一尾的两件大事,不免引起我浮想联翩。

在“人居二”大会上,尽管纷纷嚷嚷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它将对促进下一世纪人居环境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;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一点必然逐渐更为人所认识。而大会的两个主题——“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”与“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”,已成为全球跨世纪的任务。当然,目标的达到还需要我们进行长时间的不懈努力。特别饶有兴味的是,大会的两个主题与我 50 年前在中大图书馆所见的“战后城市重建”与“战后住宅建设”两个议题,又是何等的对应!所不同的是,又经历了半个世纪后,世界问题的焦点已经从战区遍及到整个地球的人居环境,而问题的深度与复杂程度更远远胜过往昔。这说明,城市与住宅——人居环境的两个基本问题,仍然在困扰着人类。

对于“人居二”大会的文件,我还将认真研究,联想到下面几个问题,不免有感而发。

一、我们尚在重复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错误

40 年代初开始自学城市规划之时,我心中衷心希望发生在西方城市的交通拥挤、住宅缺乏、失去自然……这类“城市病”不要在中国发生,甚至可以说,我是抱此目的而学习城市规划的。

解放后,我回到祖国参加建设,更有一种天真的思想,认为“城市病”是资本主义的产物,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不仅可以避免,而且可以建设得更好。

又几十年过去,现实所发生的一切,远非如此。这使得我清醒、焦虑:人口问题、住宅缺乏、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、土地投机、建筑混乱、私人小汽车猛增等等,西方城市发生的一切不仅已经在我国发生,且有一发难于收拾之虞。有些事情我们并没有摆脱,而是在重复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错误。并且,我认为:

——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,城市建设的伟大成绩常常伴随城市化带来的复杂问题,对城市病及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能低估。

——城市不能盲目发展,不能没有规划;但是另一方面,城市规划的发展也在经历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。在我国,这门学科还没有十分成熟,也不能“包治百病”。我们要努力发展城市科学,千方百计地加强其科学性。

——规划工作者要逐步学会同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生态学家等各方面专家,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,共同合作,协调关系,进行各种有目的的工作,以促成规划的实现。

——建设好城市是建筑规划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,但建筑师与规划师必须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;一个良好的城市建设的政策、方案,必须为政府所采纳,依赖政府来推进,有关城市发展的各项政策必须相互协调、配套;此外,良好的城市建设与健康的生活环境的取得,还有赖于广大市民的参与,

即要让全社会关心人居环境科学。

因此,理想的城市是需要与理想的社会共同缔造的。良好城市的创造,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,而是人类社会进行改革,推进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。我们的工作更是任重而道远。

二、道路是曲折的,前途是光明的

近百年来,对城市问题的种种观点,可以说是乐观与悲观交织。

悲观乎?

40年代出版了一本城市规划著作,它是在1933年现代建筑师学会(CIAM)雅典会议背景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。面对日益增长的城市问题,此书著者前哈佛建筑学院院长塞蒂(Sert)以“我们的城市能否存在?”(Can Our City Survive?)作为书名。

几十年后,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,又印发了一本基础报告,却以更为急迫的声音昭告全世界:“只有一个地球”(Only One Earth)!

从1967年开始,“罗马俱乐部”集中了约100位各方面的科学家从事研究,他们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管理不当的体系,人口急速增长,汽车塞满街道,能源供不应求,武器成倍增长,污染迅速蔓延……。限于地球的资源,他们以更惊人的“语调”提出“增长的极限”(The Limits To Growth,1972年发表)——“零增长”理论,成为典型的未来研究的悲观派理论。

乐观乎?

对世界事物持乐观态度的也大有人在。他们的基本论据认为,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固有特征,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持续发展的动力,没有必要杞人忧天。

这种乐观与悲观交织的现象,即使在伊斯坦布尔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上,也反映得非常突出(周干峙院士参加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印象)。

通过多年的工作经历,本人也常常是忧喜参半,时而乐观,时而愁绪满怀、忧心忡忡。但我寄希望于人类的觉醒,只要看看这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人居环境运动的进展情况,就可以看出世界是在进步,前途是光明的。试看:1965年,成立世界人类聚居学会(World Society of Ekistics);1976年,联合国在温哥华召开联合国第一次人类住区大会;1981年,国际建协召开“人类、建筑与环境”国际大会,并通过“华沙宣言”;1982年,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家协会(ISOCARP)倡导“住者有其房”(Habitat For All);1983年,欧洲议会发起城市复兴运动(Urban Renaissance)等;1987年,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布伦特兰(Brundtland)报告“我们共同

的未来”,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;1992年,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“环境与发展”全球首脑会议;1995年,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“社会发展”全球首脑会议;直到伊斯坦布尔这次“人居二”大会的胜利召开。

这本身说明,人类对居住环境的认识逐渐加深,人居环境科学逐渐发展,学术思想活跃;对它的研究已从局部到整体,从技术到战略,从微观到宏观,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,并且不仅从国家与地区角度来研究问题,而且把全球看作整体进行综合性或专题性的研究。从此,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的主题,对这方面的研究,已从学者的书斋变为世界首脑的共同行动;它标志着人们对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的种种努力已逐渐深入,更为自觉了。

早在约半个世纪以前的1951年,格尔蒂尼(R. Guerdini)就已指出:“世界不能任其自流,必须由人们加以引导。”(见G. Albers,《1950年以来城市规划思想和目标的发展》,1974年)现在,这个时期终于到来了。

三、可持续发展——未来世界战略的主旋律

从里约热内卢到伊斯坦布尔会议的积极贡献之一,就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推进,达成了国际共识,克服了悲观、无所作为的思想。

在最近写的一些文章中,我曾不止一次谈到可持续发展问题,这里不多赘述。仅阐述几点。

第一,可持续发展这一名词看来很新鲜,其实中国古代哲人就有许多类似的光辉思想,我们宜加以发掘整理,以弘扬中华文化精神。如孔子的名言:“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”,说明我们必须“多谋”、善于规划。又如《孟子》所述,“不违农时,谷不可胜食也”,“数罟不入夸池,鱼鳖不可胜食也”(注“数罟”指密网,古代“鱼不满尺不得食”),“斧斤以时入山林,材木不可胜用也”,“谷与鱼鳖不可胜食,材木不可胜用,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”。我们还有句俗话,更明白不过地说出这个道理,“我们不能享祖宗福,造子孙孽”。

第二,我们还可以从国外文献中吸取营养。如印度前被刺杀总理甘地(Mahatma Gandhi)有一句名言,常为国际人士所引用。他说:“地球具有足够的蕴藏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,但不能供每一个人的贪婪(Earth provides enough to satisfy every man's need, but not for every man's greed)”。又如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——《面向未来——澳大利亚与世界下一个100年》(Charles Birch, “CONFRONTING THE FUTURE——Australia and the World; the Next Hundred Years”, revised edition,

1993),书中见解也颇有意义。

第三,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要落在实处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,正在全世界传播、推进。中国在里约会议之后,立即发表了《中国 21 世纪议程》白皮书,从此把持续发展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,明确经济增长方向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。可持续发展战略,不仅限于资源、环境,还包括城乡建设、文化、卫生各方面,这是科学地、最大限度地运用地球的物质资源,以保证人类幸福的战略措施,也是推进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。但是,只要注视一下我国的实际情况,又不能不令人焦虑!即以耕地来说,城市在发展,耕地在锐减——广东人均耕地仅 0.52 亩,福建 0.57 亩,浙江 0.58 亩,江苏 0.95 亩(据《1995 年中国统计年鉴》)我国人均耕地只有 1.2 亩,为美国的 1/9.5(见何祚庥在中国科学院第八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:“对中国的基本特点——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的反思”)!东南沿海各省市是土地质量最好的地方,却浪费惊人;在中国耕地问题这样严峻的情况下,竟然到处侵占农田,建造名目繁多的“花园别墅”,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。足见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,还需要长期、艰苦的努力与切实的工作。

四、“科教兴国”——以决策的科学化推进决策的民主化

城市规划好、建设好,就能作到多快好省;相反,不规划盲目发展,或有规划但不认真执行,随心所欲地另搞一套,不符合科学原则、不仅必然少慢差费,甚至后患无穷。

对于我们专业人员来说,首先应要求自己竭尽全力从事科学化的决策研究。

本文一开始就没有讳言城市规划是尚不成熟的学科,是尚在发展中的学科。请看,100 多年前近代城市规划学的酝酿,即产生于对大城市的危机感;而时至今日,它的危机感仍然存在,仍在令人困惑。西方如此,中国亦然。最近,国家领导人在“全国土地日”发表的讲话,又谈到控制大城市发展的问题。过去,城市规划只注意工业,很少涉及农业;今天,城市发展与耕地的矛盾已非常尖锐,城市农业问题,特别在城镇密集地区保护耕地的问题,更是非常迫切而不可忽略!

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变化,新的不确定因素时时存在,人居环境的新问题必然随之层出不穷。这需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加强思想修养,以乐观精神、忧患意识,对城市建设中所发生的问题,审时度势,因势利导,努力作好决策,防患于未然。这样,“科教兴国”就不仅是一般的号召,而是落实在我们工作中的具体行为。

建筑与城市规划工作有它的特点,无论大型基础设施或建筑工程的兴造,必须耗费为数不一的大量资金;任何方案的审定,必须有各方面业主的认可,他们的见解(好的或不好的见解)往往左右着设计(过去造园即有所谓“三分匠,七分主人”之说)。正因如此,建筑师、规划师在接受任务的过程中,必须充分与业主沟通、交流,要善于通过扎实的工作、雄辩的论证,提高方案的科学性与艺术性,以求最终付诸实施。

但是,我们的工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,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由于立足点不同、观点不同,设计人、决策人修养各异,意见不一的情况是正常的。无论如何,规划设计者要高瞻远瞩,努力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矛盾、长远与现实的矛盾、需要与可能的矛盾,等等……;即要反复申述这一工作的意义,力求得到社会共识。当然,有时结果并不全令人满意。对专业工作者来说,首先不能怨天尤人,而是应当努力以自己的切实工作加强其科学性,以决策的科学化来推动决策的民主化。我们的工作尽管很艰难,然而也有成功的例子。如对北京亚运会的规划设计研究,经过组织大量的人力,包括博士生的专题研究、毕业班师生参与规划设计,终以充分深入的科学论证为国务院所采纳,节约了国家的资金,也取得良好的效果。这类事情教育了我,使我坚信建筑工作者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,通过积极的努力、创造性的工作,可以为“科教兴国”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回顾 50 年前,我在松林坡上徘徊,当时空袭频仍,战火纷飞,神州大地,满目疮痍;而今天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,繁忙于城乡建设。从伊斯坦布尔的高岗上四顾环球,展望 21 世纪,我们有理由相信:世界是进步的,前途是光明的,道路是曲折的,矛盾是普遍存在的。联合国“人居二”大会提出,要“在世界上建设健康、安全、公正和可持续的城市、乡镇和农村”。纵想半个世纪以后,即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得以复兴,上述目标有所实现,城市与建筑仍然会产生新的问题,诸如城市是否发展得过多、过大?住宅情况在已经有很大改善的情况下,也可能仍存在新的需求问题,人文主义的发展问题,新的社会问题、生态问题等等。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后代以新的困惑,但还要继续努力,继续前进。总之,悲观的观点、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毫无益处,我们的目标还是要“放眼未来”,“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”。

以上是 50 年来我的探索道路和认识,谨以至诚寄语我国跨世纪的建筑与规划师们!

【附记】伊斯坦布尔会议后,回顾往昔,夜不能寐,聊记所感,作为本人新著“迎接新世纪的来临”一书之结尾。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